

第十二講 思想史的新視野

壹、講授內容摘要：

1.前言：思想在歷史發展中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是一切人爲事件產生的內在因素，所以，思想史研究乃於史學之中別佔畛域，有其獨特的重要性。

1:1 廣義的思想史根據研究範疇與重心的不同，而有「思想史」、「概念史」與「哲學史」等稱謂上的區別。「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較爲留意思想與思想外之客觀結構如政治經濟間的互動，其重點尤在透過通史來把握思想流變之歷史意義；「概念史」(history of ideas)假定人類思想有某種程度的自主性，可獨立於社會政治等外緣因素而分析，企圖釐清單位觀念(unit-idea)或觀念叢(Ideas-complex)之演化；「哲學史」(history of philosophy)所研究的對象爲某一哲學傳統之持續與變遷，側重於哲學體系內在的邏輯關係。三者範圍雖有一定的分野，卻也有其重疊之處。¹本講所謂「思想史」一詞指涉範圍較廣，係包含以上三者之廣義思想史。

¹ 參考：黃俊傑：〈思想史方法論的兩個側面〉，收入：黃俊傑編譯：《史學方法論叢》(臺北：學生書局，1981年增訂新版)，頁243-301。

1:2 本講問題：思想史有各種不同的研究進路，為求講述方便，可分為「外在研究法」與「內在研究法」。本講試圖對以下幾個問題進行探討：

(1) 思想史的「外在研究法」及其理論基礎何在？如何應用？

(2) 思想史的「內在研究法」有何方法論預設？其優點及其限制何在？

2. 中國思想傳統的特質：在論述中國思想史研究方法前，有必要擇定傳統思想的若干特質略加說明，以作為論述之背景：²

2:1 中國思想傳統具有強烈的現世關懷，所以中國思想以「經世」為其特徵：中國思想家對「人」往往懷抱著無限信心，希望能正面地承擔各種苦難，從而轉化並提昇客觀環境。

《易》〈繫辭傳〉云：「聖人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說明中國哲思的創發與改變現實、救贖世界之目的無法脫離；幾千年來的中國思想史，正是歷代思想家堅持理想、批導人心的總紀錄。

2:2 中國思想傳統強調由少數菁英份子或道德之士佔據高位以轉化整個社會：中國思想家提出的具體政論雖不盡相同，但皆展現了某種程度的「精英主義」(elitism)，認為在

² 本講授課內容之詳細論述，參看：黃俊傑、蔡明田：〈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試論〉，《人文學報》(國立中央大學及學院)，第16期，1997年12月，頁1-43。

社會的頂點有一「神聖位置」(sacred space)，控制此位者（通常是王權）便具有超越性的力量，藉其個人之智慧與道德修養，可以改變整個社會結構。這種思想主要表現在「政教合一」的傳統上。史華慈 (Benjamin I. Schwartz) 稱這種「精英主義」信念為「中國政治思想的深層結構」。

2.3 中國思想家論述對當代現實的看法，經常不質直言之，而用曲折委婉的方式表達：由於受到溫柔敦厚之《詩》教傳統的影響，再加上各朝代專制政治的壓力，促使中國思想家產生了一種所謂「比興式的思維方式」，在這種思維傳統下，經典注疏以及歷史研究常是歷代學者批判時政的重要途徑，這種途徑可稱之為「作為政治學的中國詮釋學」。所謂「作為政治學的中國詮釋學」具有兩大特徵：(1) 政治學是一種道德學。思想家透過對經典「是什麼」的再釐清，而提出他們對時代「應如何」的方案。(2) 這種政治學以涉及政治秩序的安排方式（所謂「治道」）為主，較少涉及政治之原理（所謂「政道」）。例如宋儒對孟子政治思想的爭辯、十九世紀末康有為的《孟子微》，都是他們提出政治思想的一種方式。歷史研究亦復如此，王船山的史論充寓他對當時政治的意見，就是一個例子。

3. 「外在研究法」之理論基礎及其問題：儘管中國思想史之研究，方法多端，一隅不足以窮之，然就大方向言，約可歸納為「外在研究法」與「內在研究法」兩類。「外在研究法」特重思想與歷史情境的交互關係，其中心課題在於探討人類對本身所處之

環境的意識反應。

3:1「脈絡化」是「外在研究法」最核心的研究方法。「外在研究法」乃是將人置於歷史情境的脈絡中加以觀察分析，研究者所關心的問題如下：

(1) 中國思想家在何種歷史環境或脈絡裏提出其理論系統？

(2) 思想家提出理論時，與當代或後代之歷史情境有何互動關係？

(3) 在何種具體而特殊的歷史脈絡下，思想傳統的哪些問題會被思想家加以顯題化而成爲具有時代意義的重大議題？

(4) 思想家在何種語言情境 (linguisticity) 之中提出其論述？

諸如此類的問題還可繼續列舉下去。

3:2 這種「脈絡化」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相應於中國思想的經世取向而提出的。在當代學人中，以徐復觀、余英時較能作爲此一研究進路的代表。

(1) 徐復觀說：「中國思想，雖有時帶有形上學的意味，但歸根究底，它是安住於現實世界，對現實世界負責；而不是安住於觀念世界，在觀念世界中觀想。」由於徐復觀掌握了中國思想之現世取向的特質，所以他認爲歷史上的一切思想，都是爲了適應當時社會某種要求而產

生的，因此受到各種外在環境的制約與影響。

基於這種看法，徐復觀在撰寫《兩漢思想史》時即先把握住漢代政治社會結構的大綱維，《兩漢思想史》第一卷「西周政治社會的結構性格問題」、「漢代專制政治下的封建問題」等論文，也都緊扣住具體的歷史情境，從時代脈絡下尋求兩漢思想發展演變的軌跡。³

(2) 余英時曾說：「我的基本立場是儘量把中國的思想傳統和它淵源所自的價值系統與生活方式緊緊地結合在一起」、「思想史、文化史和社會史之間存在著交光互影的關係，不能清楚地劃分界線」，⁴這些話語透露了余先生認為思想必須與整體歷史背景一起考慮後，才能加以分析。

舉例言之，余英時所著《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胡適》一書，起首標題是「胡適的出現及其思想史背景」，探討胡適之所以能於短暫時間內取得中國學術領導地位的原因。余英時認為「一九一七年的中國學術界恰好有一段空白被胡適填上」，從此假設出發，余英時追問：這一段空白究竟屬於何種性質？為何是胡適而非他人填上這段空白？全文論證環繞著這些基本課題，將胡適「脈絡化」於當時歷史背景裡，逐一對胡適「思

³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臺北：台灣學生書局，1978年）。

⁴ 余英時：〈自序〉，收入：《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7年），頁（一）、（二）。

想的形成」、「方法論的觀點」、「實驗主義的思想性格」、「思想的內在限制」各部分作出細膩的解釋與批評。⁵

此外，余英時所撰《陳寅恪晚年詩文述證》一書，前半部由「陳寅恪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切入，先論述陳寅恪晚年共產黨統治的景況，從而離析出陳氏當時的心理與情感，使其詩幽微隱晦的意義獲得彰顯。例如陳寅恪〈辛卯七夕〉詩云：「天上又聞傷離別，人間虛說誓長生。今宵獨抱綿綿恨，不是唐皇漢帝情」，余英時詮釋此詩乃在詠南北韓板門店和談，字裏行間都對和談效果與毛澤東有所批判。余英時認為陳寅恪即使在晚年也密切重視國內外局勢，然因深切領略到極權政治的壓力，所以只能用艱澀難懂的辭語表達意旨。余英時說明自己的研究方法：「完全師法陳先生《柳如是別傳》的範例，絕非有意地穿鑿附會。陳寅恪既用剝蕉見心的方法箋釋古人的詩，則他自己的詩也必須通過剝蕉見心的箋釋才能完全瞭解」，可見此書乃是身為研究者的余英時，對其研究對象陳寅恪之研究方法所作的巧妙運用。⁶

3:3 這種研究方法的理論基礎在於：人是「歷史人」，人的思想與行動，深深地受到歷史條件的制約。這種人性論主

⁵ 余英時：《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胡適》（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年）。

⁶ 余英時：《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4年）。

張，最大的慧識乃在掌握了人之存在的具體性，尤其是人之存在於複雜的社會經濟與政治關係網絡這項事實，因此「外在研究法」對於各家思想之所由起，以及思想與世界的互動關係，往往能提出較為圓融的解釋。

3:4 但是，「外在研究法」的理論基礎如果推到極致，就會將思想人物完全視為社會結構制約下的產物，而使人的自主性為之淪喪，不免流為某種形式的「化約論」——認為思想只不過是人心對外環境之刺激所作的反應，因而忽視思想家超越時代藩籬的創發面。再者，由於「外在研究法」的注意焦點為思想與環境之間的關係，因此對於內容豐富卻未在歷史上產生重大影響的思想家，往往給予過低的評價。

「外在研究法」所潛藏的侷限性，使研究者在分析過程中往往拙於應對以下問題：

- (1) 何以同一時代的思想人物會提出南轅北轍、形同水火的思想？
- (2) 在歷史變遷的關鍵時刻裏，為何同屬於某團體的思想人物，會有不同的政治見解？

為了深入掌握上述問題，從而提出相應的解答，研究者必須體認到不同的思想人物都是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個體，而非「客觀」歷史環境的奴隸。

4. 「外在研究法」的應用：爲了進一步分析「外在研究法」的優點及其侷限，以下藉由對中國思想史中「義利之辨」這個思想主題的研究，說明：

4:1 歷史脈絡的解明，使思想家之論述所針對的對象及其意向性 (intentionality)，為之豁然彰顯。例如從「外在研究法」的立場看來，孟子之所以嚴「義利之辨」，部分原因乃是受到了當時墨學大興的刺激，⁷而董仲舒與司馬遷之所以對「義利之辨」思想加以闡發，乃是爲了矯治當時政治及社會逐利的風氣；他們所欲指涉的對象或論述意圖，唯有透過具體的歷史情境才能較爲完整地理解。

4:2 但是，如果完全運用「外在研究法」，那麼對於思想體系裏諸多「單位觀念」間的複雜關係，往往不能精確解析。例如中國思想史上的「義利之辨」牽涉到許多問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普遍」與「特殊」的對待問題。「普遍」與「特殊」的對待這個問題之另層意義，就是「全體」和「個體」的對待，它落實在社會經濟的具體實現上就是「公私之分」的問題；一旦落實到政治層次也就激發了歷代儒者聚訟紛紜的「王霸之別」。⁸完全從「外在研究法」的角度，就可能無法深入掌握這些概念之分合與轉折變化，因此必須尋求「內在研究法」的奧援。

⁷ 黃俊傑：《孟學思想史論（卷一）》（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年），頁122-132。

⁸ 同上書，頁112-113。

5. 「內在研究法」之理論基礎及其問題：「內在研究法」所側重的是思想系統內部觀念與觀念間的結構關係。

5:1 「內在研究法」乃是在理論上先假定：一個思想或概念被提出後即取得了自主性的生命，成為可在公共領域裏自由發展的論述，不受社會政治環境變遷的支配。例如中國思想史上許多重要的命題如「義利之辨」、「民本思想」等，其形成過程固然與時代背景有關，但它們一旦被提出後，就脫離了當時的歷史情境，而成為一個可被不斷推衍、批駁或者補強的議題，持續地吸引後代思想家的注意。

5:2 「內在研究法」特別重視解析思想體系在理論發展上的周延性，以及體系中諸多「單位觀念」本身的意義與彼此間的複雜關係。採用這種方法的研究，通常集中於特定的思想家、學派或者時代思潮，對他們思想的內在結構進行分析，經常探討的問題如下：

(1) 某個思想家、學派或者時代思潮，發展了哪些不可再加以細分的「單位觀念」？這些「單位觀念」之結構性或階序關係為何？

(2) 思想系統中潛藏著何種「未經明言的」(tacit)的「文法」或「深層結構」？

(3) 思想系統的理論周延性為何？

5:3 以下舉黃俊傑《孟學思想史論（卷一）》作為「內在研究法」的例證：此書主要在討論孟子之思想體系如何在幾千年來的東亞世界重新被理解，第一章〈序論：孟子思維方式的特徵〉，首先論述孟子辨證問題時所呈現的兩大思維方式之特徵，並藉以貫串全書各篇章。第二章〈孟子思想中的生命觀〉，分析孟學中重要的核心概念如「自然」與「人文」、「身」與「心」、「個人」與「社會」等，彼此乃為有機之結構關係，從而陳述孟子對「自我」本質的觀點。第三章深入考察孟子及其後學對心身關係的看法及差異。第四章論述孟子對群己關係的看法與政治觀。第五章與第六章，則以「義利之辨」與「王霸之別」這兩條思想線索為中心，探討孟子的社會與政治思想。

5:4 此種研究方法的優點，在於能對各種思想之「內部結構」作較充分的解析，然而對思想之「發生脈絡或歷程」的掌握卻常顯得無力；對思想家論述的「言內意旨」（locutionary intention）有較細緻的探討，但對「言外意旨」（Illocutionary intention）與「言後意旨」（perlocutionary intention）則較少措意。

6. 「內在研究法」的應用及其侷限：例如研究者為了解「王霸之別」這個由先秦儒學發展出來的問題，可以分析孔、孟、荀政治思想中，「王」與「霸」、「德」與「力」、「質」與「量」等不同概念的分合關係，深入探討此項命題的內涵。然而「王霸之別」的概念原是在戰國晚期歷史情勢的催逼下形成的，因此一

且被抽離發生時代的背景，便很可能遭致誤解。後世許多儒者對孟子「不尊周王」的觀念加以韃伐，違背孟子「尊王黜霸」的真義，即是因為對此項命題的歷史脈絡掌握不足而造成的曲解。

7.結論：思想史研究所謂的「內在研究法」與「外在研究法」，其實只是種「理想類型」，而且是為了討論方便所作的人為區分。事實上，在實際研究過程中，兩者應該交互為用，相與啓發；也只有兩者並行，才能相得益彰，左右逢源。

貳、閱讀作業：

- 1.黃俊傑等：〈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試論〉，《人文學報》（國立中央大學及學院），第16期，1997年12月，頁1-43。
- 2.黃俊傑：〈思想史方法論的兩個側面〉，收入：黃俊傑編譯《史學方法論叢》（台北：學生書局，1981年，第三版）。
- 3.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年）。

參、參考讀物：

- 1.Dominick LaCapra, "Rethinking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Reading Texts," *History and Theory*, XIX:3 (1980).
- 2.林載爵譯：〈政治史與思想史短辯—特指非西方文化〉，收入：《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第三篇。

3. Felix Gilbert , “Intellectual History : Its Aims and Methods” in *Historical Studies Today*, pp.141-158.中譯本見李豐斌譯：《當代史學研究》，第四篇。
- 4.徐復觀：〈研究中國思想史的方法與態度問題〉，收入：《中國思想論集》（台北：學生書局，1975年），頁1-11。
- 5.徐復觀：〈答輔仁大學歷史學會問治古代思想史方法書〉，《幼獅月刊》，263期，1957年11月，頁24-26。
6. (Arthur F. Wright)，〈中國思想研究の新方法〉《東方學》，第十一輯，1955，4，頁130-137。
- 7.阮芝生：〈學案體裁源流初探〉，《史原》，1971年10月，頁57-75。
- 8.B. Schwartz 原著，張永堂譯：〈關於中國思想史的若干初步考察〉，收入：《中國思想與制度論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76年），頁1-3。
- 9.王爾敏：〈近代中國思想研究及其問題之發掘〉，《新知雜誌》第二年第三期，1972年，頁47-68。
- 10.木全德雄：〈思想史研究の方法論に關する二、三の問題〉，收入：《中國哲學史の展望と摸索》（東京：創文社，1976），頁27-45。
- 11.武田清子編：《思想史の方法と對象--日本と西歐》，（東京：創文社，1976），頁6-8。

肆、思考問題：

- 1.所謂「觀念史」與「思想史」研究方法有何差異？各有何種方法論上的問題？
- 2.中國思想史研究有何種方法論上的特殊問題？